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全国翻译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荐用书

总主编 谢天振 柴明颀



*Introduction to
Medio-Translatology*

译介学导论

| 第二版 |

谢天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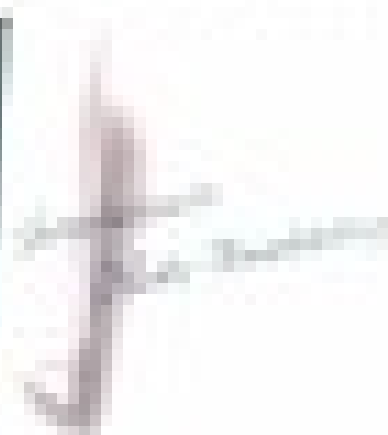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清华大学“双万”行动计划

清华大学出版社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100084 Beijing, China



评介学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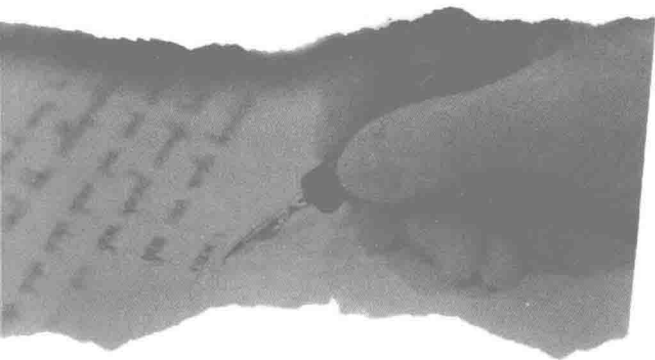
第二版

张其成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译介学导论

| 第二版 |

谢天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介学导论 / 谢天振著. —2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1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ISBN 978-7-301-28995-2

I. ①译… II. ①谢… III. ①文学翻译—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04452 号

- 书 名 译介学导论 (第二版)
YIJIEXUE DAOLUN
- 著作责任者 谢天振 著
- 责任编辑 郝妮娜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995-2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bdhnn2011@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 印刷者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18.75 印张 35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2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52.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

编委会

主编：谢天振 柴明颀

编委：（以汉语拼音为序）

程朝翔 何其莘 黄友义 蒋洪新

金 莉 李绍山 廖七一 刘和平

穆 雷 许 钧 仲伟合

总 序

谢天振 柴明颀

翻译和翻译研究在我国应该说有相当悠久的历史了,有人根据《册府元龟》里的一则记载,推测中国的翻译活动距今已经有4300年左右的历史。^①还有人把三国时期支谦写的“法句经序”推作中国翻译研究第一篇,据此声称中国见诸文字的翻译研究至今已有超过1700年的历史了。^②这些事实,自然让我们感到自豪。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翻译学的学科建设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其中原因,我们以为恐怕与长期以来我们对翻译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性质认识不足有关。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甚至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院校里,翻译和翻译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学科(an academic discipline)、一门“毫无争议的独立学科”,然而在我们中国内地的高等院校里,翻译更多地是作为外语教学或学习的手段,所以它的位置也就更多地放在相应的外语学科之下。而翻译研究往往只是作为某一外语学科下面的一个“方向”,譬如在英语语言文学学科下有一个“翻译方向”,这个“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可以研究翻译,撰写关于翻译的学位论文,但他们得到的学位仍然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位。20世纪90年代初,曾有过

① 《册府元龟》里的《外臣部朝贡》有一条记载:“夏后即位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三年,方夷来宾。”参见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第1页。

② 参见罗新璋:《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4页。

短暂的一两年时间,在我国国家教委(现教育部)颁布的学科目录(见诸少数几所高校的研究生招生目录)中出现过“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硕士学位点,但后来很快就消失了。再后来,翻译就作为应用语言学下面的三级学科了。这种变化的背后从一个方面反映出了当时我国学界对翻译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和对它的定位。

值得庆幸的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我国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的学科建设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界的理论意识空前高涨,学科意识也日益觉醒,于80年代后期译学界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口号,至90年代译学界的有识之士都已认识到,“翻译学之在国际上成为一门独立‘学科’(discipline)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应该做的,就是要“加强与国际译坛的对话,借鉴引进国外最新的翻译理论,结合中国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加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迎头赶上世界潮流,为国际翻译学科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终于,在进入新世纪以后,上海外国语大学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相继建立了独立的翻译学硕、博士学位点。此事不仅是从学科体制上对翻译学学科地位的确认,它更为我国内地高校的外语院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学科和学术生长点。紧接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07年1月正式通过设立翻译专业硕士学位(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简称MTI),同年包括北大、上外、广外在内的15所院校获准开始招收MTI硕士生,从此拉开了我国翻译专业教学的帷幕。

翻译学硕、博士点和MTI学位点的建立,对翻译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对翻译专业教学的理念探讨,以及对翻译专业教材的编写等,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翻译和翻译研究视作外语教学和研究的一个附庸,如今我们要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建设,来发展,就必须从理论上深入阐释它与传统外语学科中的翻译教学与研究的实质性的区别。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外语学科的大发展,各个语种、各个层次的翻译教材层出不穷,成百上千,那么我们今天编写的翻译教材又该怎样体现翻译学的学科特性呢?为此,我们邀集了国内翻译学领域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一个编委班子,策划推出一套

“翻译专业必读书系”，以期对国内刚刚起步的翻译学学科理论建设和教学教材建设尽我们的绵薄之力。

本“书系”由两个开放的系列组成。第一个系列是与 MTI 课程设置相配套，可作为 MTI 教学选用的教材系列。这套系列同时也能作为广大报考翻译专业(方向)研究生学位考生的考研参考书，或作为进入正式 MTI 教学训练学习的教学用书。目前正在编写的有：MTI 专业笔译教材(一套四册)，MTI 专业口译教材(一套四册)，《简明中国翻译思想史》《简明西方翻译思想史》和《西方文化概要》。第二个系列是与翻译学学科理论建设相关的译学理论专著，拟成熟一本推出一本。

无论是 MTI 的教材编写，还是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理论探讨，都是充满挑战的全新事业。我们深知自己才疏学浅，本“书系”肯定存在不少不足之处，我们殷切期望国内外专家学者以及广大师生读者不吝指正。

自序

《译介学导论》是我十多年前的一本旧著，当年应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严绍盪教授之邀，在拙著《译介学》和《翻译研究新视野》基础上，并结合我多年执教“译介学概论”课的讲课材料编写而成，列为严绍盪教授主编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之一种，同时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之一种，于2007年出版。出版后反响似还不错，于2013年还重印了一次。

时间真快，转瞬之间，《译介学导论》出版至今已经满10年了。2016年11月底北大出版社张冰博士来南宁开会，见面时提到出版社有意跟我续签拙著的出版合同，并拟推出《译介学导论》的第二版。她嘱我尽快把第二版的定稿寄给出版社，我当即表示同意，答应尽快把修订稿寄给出版社。

第二版正式进入编辑程序后，责编郝妮娜老师告诉我，张冰博士考虑把这本《译介学导论》(第二版)从原先的“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中抽取出来，作为“翻译专业必读书系”之一种推出。我获悉后觉得这个考虑很有道理，一方面它迎合了当前国内高教界正在蓬勃发展的翻译学科的需求——目前国内高校设立翻译本科专业和翻译专业硕士(MTI)学位点都已超过了两百所，且还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纳入“翻译专业必读书系”也可以更好凸显《译介学导论》作为中国学者独创的翻译理论的性质。事实上，我当初写作《译介学导论》的基本出发点也就是对自己的译介学思想作一番梳理。拙著从三个大的方面论述了译介学的基本原理：首先交代译介学理论思想的历史渊源，其次揭示当前国际和国内比较文学界和翻译学界的学术背景，最后阐述译介学的理论基础，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了本书的“绪论”和第一、二、三章的基本内容。



“绪论”部分我主要论述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特别是在著名英国比较文学家苏珊·巴斯奈特在其于1993出版的《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一书中提出,比较文学应该成为翻译学下面的一个子学科之后,更是引起了国内外比较文学界对两者关系认识上的混乱。因此,在“绪论”部分着重分析了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与传统意义上的翻译研究之间的差别,以及比较文学视野给翻译研究带来的新视角和所揭示的新研究层面。与此同时,“绪论”也谈了翻译研究在拓展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丰富比较文学的研究内容方面的贡献。

第一章“翻译研究的文学传统和当代译学的文化转向”主要阐述了译介学诞生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当前的国际译学背景。译介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引起越来越广泛的注意和重视,然而译介学并不是平白无故地发生、发展起来,它有它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外翻译研究史上绵延千年的翻译研究的“文艺学派”为它提供了非常丰富、扎实的文化积淀,而最近三四十年来国际译学界中发生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更是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并直接促进了译介学在当今国内外译学界和学术界的蓬勃发展。

第二章“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国内译学界认识上的误区”把读者的目光引向国内翻译界和译学界,具体探讨了国内翻译界在译学观念认识上的滞后问题,这也是在当前中国我们研究译介学的现实意义。但是有一个问题本来在这一章里是可以谈、但我没有展开谈的,那就是与国内翻译界在译介学认识上的误区适成对照的是,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比较文学界,他们对于译介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诸如误译的研究意义和价值问题、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当代文化理论与翻译研究的关系问题,等等,都觉得很容易理解和接受,没有任何疑问。而在我们国内的翻译界和译学界,却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充满疑虑、不解甚至排斥,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将来承担中国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重任?因篇幅关系,我对这个问题只能在以后另外撰写专文予以展开和讨论了。

第三章“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讨论的是译介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即创造性叛逆。我觉得只有承认了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

叛逆,那才有可能谈得上译介学中的其他问题,诸如“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译者的主体性”“译作的相对独立价值”,以及“误译的价值”,等等。这个命题也是最容易引发国内学术界和翻译界误解的一个问题,有人提出应该区分“好的创造性叛逆”和“破坏性的创造性叛逆”,还有人甚至破口大骂“创造性叛逆”是在“教唆胡译乱译”,因此我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对这个命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

第四至第九章是从两个方面展开论述的,前三章探讨的是译介学研究的实践层面:第四章“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谈的是翻译中文化意象的传递与误译问题,通过这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讨论,我想让读者能够从文化层面上去发现和思考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第五章“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和第六章“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分别谈了翻译文学的性质与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以及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关系与区分问题。这是两个非常大的问题,里面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可以发展,对此我在第十章里有所说明。后三章也即第七至第九章则展示了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前景,我分别选取了解释学、解构主义和多元系统论这三个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作为个案进行阐释。其实译介学的理论研究前景远不止这三个层面,但具体谈了这三个理论以后,读者就可以举一反三,自己去发掘新的理论研究层面了。

最后一章,也即第十章“无比广阔的研究前景——译介学研究举隅”是我专为本书设计安排的。没有这一章,我觉得我这本书仍然只是一本纯粹的研究专著,有了这一章后,本书就比较明显地兼具了教材的特色。其实,这一章的设置也是受了严绍璁教授当初为“21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所写的“出版总序”的启发。严教授在他那篇“总序”里写道:“这套教材的根本宗旨,应该在于使中国人明白到底什么是‘比较文学’,并且使对这一学科有兴趣的中国人懂得到底应该怎样做‘比较文学研究’。”我很赞成严老师的这一观点。迄今为止,国内比较文学“概论”“通论”性质的教材或专著出版了不下十数种,但比较全面地对比较文学学科的各个研究层面进行深入探讨、分析,并且能“展

现学科各个内在领域的内奥与各自的特征,并力图使读者在理解学科的总体学术框架的同时,在比较文学的众多研究层面中体验学术的实践要领”,让读者能得其门而入,这样的教材和著作却还不多。本书第十章从曾经从我攻读译介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中挑选出五篇论文,以具体展示译介学研究的空间和前景。由于这些论文的作者本身都是青年学子,尽管其中有几位作者也已经是国内学界小有名气的青年学者了,但相对而言,他们与读者的距离还是比较接近,读者阅读他们的论文也更易受到启发。

自2001年起,应四川外语学院(现四川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部的邀请,我每年都抽出一个学期赴重庆为川外的比较文学专业、翻译专业和英美文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集中开设十至十二讲译介学系列讲座,讲座结束后我要求学生撰写学期论文作为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用。令我颇感欣慰甚至惊喜的是,每次交来的学期论文中总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论文为非常优秀的论文。事实上,每年这些优秀论文中也确实有三至五篇被有关学报和学术杂志录用发表。因此,我最初在构想《译介学导论》写作的计划时,曾经有过一个想法,想在每一章的后面都附上一篇川外学生的相关论文,这样一些学生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感觉更加亲切。但考虑到篇幅有限,最终只能遗憾地放弃这个想法了。

译介学作为一个专门术语或一个专门研究领域,是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内地的重新崛起而被国内学界注目的。经过了众多学者的共同努力,译介学不仅已经成为我国比较文学界,而且也已经成为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翻译研究界的一个众所瞩目的新兴研究领域。2006年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把译介学列为当年外国文学研究的八大课题之一,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计划更是又一次把译介学列为国家“十一五”期间的外国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这些举措表明译介学正在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更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十余年来,我们国家举国上下正在关注一件事,即如何让中国文学、文化切实有效地“走出去”,走进世界各国,而译介学理论所揭示的文学译介、文化交际的规律无疑将为这一宏大的文化使命做出它的贡献。有鉴于此,我们今

天推出《译介学导论》一书的第二版,真诚地希望我们中国学者创建的译介学理论不仅为国内的翻译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同时也为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等人文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一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这里不无必要强调一下的是,译介学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仅仅属于翻译学,属于比较文学,同时也属于外国文学,甚至属于所有与跨语言、跨文化有关的学科。

目 录

绪 论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	(1)
第一章	翻译研究的文学传统和当代译学的文化转向 ——译介学诞生的历史背景	(17)
第二章	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与国内译学界认识上的误区 ——译介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48)
第三章	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69)
第四章	文化意象的传递与文学翻译中的误译 ——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一	(96)
第五章	翻译文学的性质与归属 ——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二	(123)
第六章	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 ——译介学研究实践层面之三	(151)
第七章	解释学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之一	(167)
第八章	解构主义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之二	(182)
第九章	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 ——译介学研究理论前景之三	(200)
第十章	无比广阔的研究前景 ——译介学研究举隅	(216)
附 录	译介学研究推荐书目	(274)
后 记	(282)

绪论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翻译研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学界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紧密的,直至 90 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才慢慢开始有所改变。而在此之前,在一些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和教师看来,比较文学研究的是文学,是对世界各国、各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或关系研究,而翻译研究关注的则是不同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两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并不相干。即使在一些比较文学著作或教材中也提到翻译,但多是把翻译作为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一个关注对象而已,并未意识到翻译研究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重大意义。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对比较文学的认识有失偏颇,他们往往把比较文学理解为单纯的文学的比较,而并不了解比较文学包含着许多研究分支领域,诸如文类学、主题学、形象学、比较诗学,等等,而翻译研究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被称为译介学,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对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不知道目前国际译学界的翻译研究已经越出了从前那种单纯的语言文字的技术性转换层面的研究,而已经进入到了文化层面上对翻译的全方位分析、审视和探究。就在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正当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之时,国际译学界出现了西方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向——西方译学专家们借鉴、运用形形色色的当代西方文化理论,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别开生面的切入,从而使得翻译研究不仅仅只是一种语言文字转换的研究,而是还具有了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性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使得翻译研究摆脱了对应用语言学的从属地位,取得了翻译学独立的学科地



位：在世界几十个国家两百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独立的翻译系或学科。

其实,对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国际翻译家联合会(FIT)倒是有很清醒的认识:早在1977年5月,国际译联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会议期间就曾经通过了一项特别的决议,鼓励一些比较文学专业(program)把翻译的艺术和理论正式作为它们课程的一部分。国际译联本来是一个以技术翻译为基本方向的国际组织,然而像这样一个组织竟然也通过了上述这样一个决议,这首先当然是表明了它对文学翻译和比较文学的重视,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从中窥见翻译与比较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大学里都设有以“比较文学与翻译”命名的系或专业,有的学校虽然单独命名为“比较文学系”,但在比较文学系里必定开设翻译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讲授翻译理论)。此外,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也历来把翻译视作它的主要研究对象,它的机构中不但有一个常设的翻译委员会,而且每次会议都把翻译作为主要的议题之一加以讨论。具体而言,自1967年第5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贝尔格莱德)起,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的每一次年会都把翻译列入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加以讨论。在1976年的第8届年会(布达佩斯)上,会议组织者不但把翻译研究作为专题讨论的内容之一,而且还成立了一个常设的翻译委员会^①。1988年第12届年会(慕尼黑)上,年会的三个大会主题发言之一就是翻译研究问题——“翻译研究中的‘历史’与‘体系’”,而在2000年第16届年会(比勒陀利亚)上的一个专题讨论也是“译本和译者创造的新语境”。在2004年举行的第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中国香港)上,同样有多场翻译研究的专题讨论会,不光有研讨翻译问题的工作坊(workshop),还有翻译研究专题的圆桌会议。如果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者们还是较多强调借助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翻译的话,那么,从70年代起他们已经开

^① 该翻译委员会由东西方各国共6名翻译专家组成,本书作者于2000年第16届年会(比勒陀利亚)、2004年第17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中国香港)上,与日本、韩国两名学者一起,作为东方国家的代表,连续两届当选为翻译委员会委员。

始重视结合文学翻译的特点来研究翻译了^①，而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则如前所说，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广阔的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把翻译提升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一种受译入国文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文学观念等因素操控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予以分析、进行了研究。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比较文学可以说起了相当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像对当前国际译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埃文-佐哈尔、吉迪恩·图里、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等人，他们不光是著名的翻译理论家，而且也都是当代世界著名的比较文学家。

比较文学学者之所以高度重视翻译研究，这与比较文学的学科性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众所周知，比较文学自诞生以来，它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交流、文学关系。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学要发生关系——传播、接受并产生影响，其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打破相互之间的语言壁垒，其中翻译毫无疑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翻译也因此成为国际比较文学学者最为关注的一个研究对象。

其实，追根溯源的话，我们当能发现，译介学的研究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文学家们对翻译的关注就已经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翻译文本了。1931年法国比较文学家梵·第根(Paul van Tieghem)在其专著《比较文学论》的第七章“媒介”里就提出，对译本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是把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研究，以“确定译者有没有删去几节、几页、几章或者有没有杜撰一些什么进去”，以“看出译本所给予的原文之思想和作风的面目，是逼真到什么程度，……他所给予的(故意的或非故意的)作者的印象是什么”；另一个是同一作品的几个不同译本之间的比较，以“逐时代地研究趣味之变化，以及同一位作家对于各时代所发生的印象之不同”。关于译者，他认为可以研究“他们的传记，他们的文学生活，他们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媒介者的任务”等。此外，梵·第根认为，译者的

^① 这里指的是从理论层面对文学翻译进行的研究。众所周知，文学翻译研究在西方古已有之，但上升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层面却是20世纪后半叶以后的事。